

陇右文化丛书

竹 木 春 秋

——甘肃秦汉简牍

王震亚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英昭
版式设计：王葆华
封面设计：徐晋林

陇文化丛书

竹木春秋

甘肃秦汉简牍

王震亚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 32 印张 插页 字数 180 千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00

ISBN 7 - 5423 - 0858 - 0 I·000 定价： 元

目 录

竹木春秋——甘肃秦汉简牍

一	河西地区何以出土简牍最多	1
二	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	8
(一)	天水放马滩秦简 [9]	
(二)	敦煌汉简 [17]	
(三)	居延汉简 [25]	
(四)	悬泉汉简 [30]	
(五)	其他汉简 [32]	
三	简牍源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34
(一)	简牍与简牍学 [34]	
(二)	简牍的形制、符号与分类 [37]	
(三)	简牍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42]	
(四)	简牍在文字和书法史上的价值 [55]	
四	汉简中反映的烽燧制度及防御体系	58
(一)	汉代的烽燧遗址 [58]	
(二)	汉代的烽燧制度 [65]	
(三)	汉代边塞的防御体系及政策 [74]	
五	汉简中反映的边塞移民及其屯田活动	82
(一)	汉武帝以后的徙民活动 [82]	
(二)	汉代河西的屯田 [87]	
(三)	河西屯田的历史作用 [92]	
六	汉简中反映的戍卒生活及教育管理	96
(一)	戍卒服役的年龄、期限、身份及来源 [96]	
(二)	戍卒的衣食住行及文化娱乐 [100]	
(三)	戍卒的日常事务及其管理 [114]	
(四)	戍卒的军中教育及影响 [121]	
(五)	戍卒的病休医疗及对罢卒的安置 [129]	

目 录

竹木春秋

——甘肃秦汉简牍

七	汉简中反映的汉代商品、商品价格、税收及市场管理	134
(一)	汉代商品及商品价格 [135]	
(二)	汉代的税收及市租 [143]	
(三)	汉朝政府对市场的管理 [146]	
八	汉简中反映的资本流向及土地买卖	151
(一)	汉代商业资本的流向 [151]	
(二)	商业资本流向土地的原因 [154]	
(三)	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158]	
九	汉简中反映的律令制度及诉讼程序	161
(一)	汉简中《汉律》的主要内容 [162]	
(二)	汉简中反映的汉代司法程序 [168]	
(三)	汉代的诉讼程序及审判制度 [175]	
十	汉简中反映的边塞防御组织及官吏	182
十一	汉简中反映的汉代科学文化	207
(一)	《晏子春秋》与《苍颉篇》 [208]	
(二)	汉代的年历与记时 [213]	
(三)	汉代在数学和医药学上的成就 [218]	
后记		227

一 河西地区何以 出土简牍最多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是一条东西长约千余里，南北宽约几十里至百余里的狭长地带。走廊北依内蒙古高原，南临甘、青交界的祁连山，地势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海拔在 1000 ~ 1500 米之间。走廊东部和西部自然景观有很大差异：张掖以东尚有黄土分布，愈向东土层愈厚；张掖以西，沙漠、戈壁面积逐渐增大，并有盐沼分布。整个走廊地势平坦，地面完整。走廊南部的祁连山常年积雪，并保留着一些古冰川地貌，是走廊内陆河的发源地。在走廊之内，大黄山、黑山和宽台山等把走廊分为三个绿洲灌区，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不仅是中原通往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交通要道，而且是历代封建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必经之路，在战略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古代的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十分优越。南部的祁连山峰峦叠嶂、白雪皑皑，山麓地带和山涧盆地森林密布、荆棘丛生，景色异常秀丽。走廊之内的平原地带，草原辽阔、水草肥美，对发展农牧业十分有利。秦汉之际，走廊的西部及敦煌一带被月氏和乌孙据有。当时月氏、乌孙尚处于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制时代过渡阶段，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秦二世时，匈奴冒顿单于

破月氏，迫使月氏、乌孙先后西迁。老上单于时，匈奴据有整个河西走廊，酒泉、武威一带成为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驻牧之地。这时匈奴已将近完成向奴隶制的转化，对奴隶和财产的掠夺倍受鼓励，随着奴隶制的发展，阶级分化日趋剧烈，国家机器不断完善，对外掠夺便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西汉初年，匈奴势力强大，并不断向南侵扰，给西汉王朝带来严重威胁。从高祖刘邦至景帝以前这一段时间，匈奴经常袭击边郡，当时西汉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经济有待恢复，国力尚不强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匈奴的侵扰，只好采取“和亲”政策，暂时缓和双方的矛盾。汉武帝即位后，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也空前强大，为了解除匈奴贵族对中原地区的袭扰和威胁，汉武帝一改汉初的妥协政策，对匈奴开始武装反击。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当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时，武帝派大将军卫青、李息率军出云中击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夺回河套地区，并在这里设置朔方和五原两郡，招内地七万人迁居朔方，把建设和军事守卫结合起来；同时又修缮了秦将蒙恬所设置的要塞和沿河的军事工程，这对保卫京师长安是一个有力的措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又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境内），深入匈奴千余里，大败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匈奴退出河西后，西汉占领了河西广大地区，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两郡，后从酒泉郡分出敦煌郡，武威郡分出张掖郡，史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归于西汉版图，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打通，匈奴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河西四郡设置后，汉朝政府为巩固新拓的疆土、边塞，加强边郡地区的防御力量，不仅在河西修筑了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到敦煌长达1000余里的长城要塞，而且还沿长城设置亭障、烽燧，派大批戍卒守卫。同时为解决军粮供给和长途转输的困难，

汉政府又组织戍卒和大批徙民进行屯田。当时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区就有令居屯田、武威屯田、番和（今永昌县）屯田、居延（今额济纳河下游）屯田、敦煌屯田、酒泉屯田等多处。因此西汉在河西屯田东起令居，西至敦煌，北达额济纳河下游，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屯田区，在经济、军事上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屯田规模的扩大，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牛耕方法也开始传到河西，这就使原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河西地区开始改变为农牧区。中原品种繁多的农作物，如小麦、大麦、谷、麦、糜、秫等以及水果、蔬菜开始引种，园艺业也开始在河西得到发展。由于重视水利建设和推广农业技术，汉代河西粮食产量已比较高，如敦煌一带亩产一石左右，几乎与中原地区的一般产量相当。屯田所产的粮食，除军民食用外，尚有余存，其中一部分可投入商品市场。因此，汉代对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不仅为汉朝政府在河西地区的行政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河西四郡城市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当时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成为西北地区较为富庶、繁荣的城市。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东部，因汉军军威而得名。古城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城附近），是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大城，也是西域、羌、胡贸易的中心，有人口七万六千多。自汉武帝至汉末，河西地区战乱很少，人民安居，一度出现“边城晏闭，牛羊遍野”的和平繁荣景象。当时武威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闹市，而且是汉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后汉书·孔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成为富邑，通货羌胡，一日四合。”古时集市贸易，一般为一日三次交易，而姑臧“一日四合”，足见商业贸易之兴盛。西域诸国的商旅经武威至内地贸易者络绎不绝，他们用马、农产品换取中原的大批丝绸、麻织品、棉布、漆器和装饰品。1959年，在武威新华乡磨咀子汉墓

群中，发现有大批丝织品、麻织品、锦针黼盒等，说明中西之间的贸易十分兴盛。另据有关史书记载，大宛（中亚古国）著名的汗血马，体形魁伟，四足纤细，胸颈及臀部发达，最宜做军马。当时武威市场上就有许多。据传说今武威市附近的大马营、松山滩就是出军马的地方，很可能是当年大宛马饲养和经营的地方。曾由西域输入的胡麻、核桃、葡萄等农作物，至今仍是武威的特产，尤其是核桃，武威产量很高，著名的“露仁核桃”，皮薄、个大，是一种少见的优良品种，据说其种就是从西域传来的。上述可见，武威在丝绸之路上是一座商人云集、贸易兴隆的城市。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埠。有人口 88731 口。因“断匈奴右臂，张中国之掖”而得名。古城西临若水（今甘肃境内黑河）。境内水源充足，灌溉方便，农业发达。由于河西走廊中心地带是南北交通“居延古道”（即沿若水至蒙古人民共和国浚稽山北麓）和东西交通“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所以自西汉以来，即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大夏（今阿富汗境）、安息（今伊朗境）及南亚的印度等国的商旅、僧侣、学者经张掖赴长安等地经商、学习。当时在张掖有不少西域商人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用马、骆驼、裘褐、酥酪、犴毳、玉石等牲畜和物资，换取中原的丝织品、布絮、菽粟、盐巴以及枸杞、大黄等药材。为加强市场管理，汉朝政府在这里设有市令，市平物价，“以其质剂而时损益”。另外张掖在军事上也处要地，南经祁连山、过扁都口，可达青海，北越合黎山，可达居延泽，是通往内蒙的交通大道，东西有丝绸之路相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汉政府在这里屯田戍卒，保证丝路的畅通，使张掖成为河西著名的商埠和要塞。

酒泉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古城在福禄城（今甘肃酒泉市），有人口 76726 口。据《河西旧事》记载，“城下有泉”，“其水若酒”，故而得名。又一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征匈奴到此，在军

事上取得重大胜利，武帝赐御酒犒赏三军，因酒少人多，倾酒入泉，与士兵共饮，故将此地称酒泉。酒泉一带原是匈奴浑邪王驻牧之地，霍去病击败匈奴后，开辟河西走廊，酒泉始得置郡。因其地居绝塞，东近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成为中西交通的要冲，也是西域和中亚、西亚诸国商旅与中原通商、羌戎各族往来通驿的必经之地。所以这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商人往来频繁，是河西四郡中重要的贸易市场。从酒泉东关、青沙梁、黄粮墩等地汉墓出土的大批丝织品、铜器、玉器以及由西域传入的毛褐织物等产物来看，当时的酒泉在中西贸易交换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中转站作用。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建制较早。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酒泉郡置敦煌郡”，并置玉门关、阳关以扼守。古城在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党河西岸）。《后汉书》记载说：“敦，大也；煌，盛也。”这就是说“敦煌”之名含有“盛大”的意思。有人口38335口。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总枢纽。由敦煌出发西至楼兰，再向西分两道：一缘昆仑山北麓至和阗，称南道；一缘天山南路至疏勒，称北道。自疏勒再向西南越葱岭经大月氏、大夏可至安息，这里是汉武帝以后商旅往来的主要道路。当时，自疏勒西北行，经大宛、康居还可到奄蔡。另外，由敦煌出发西北行也分两道：一自天山南路西走，会合北道至疏勒；一缘天山北路西去，也可至大宛、康居。所以敦煌作为汉代西北的国际交通中心，在中西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里贸易繁荣、文化艺术发达。城西80公里处的玉门关就是因和阗玉由此输入而得名；城西南有“渥洼池”，相传汉武帝曾在这里得到西域的名马——天马。西域和中亚等国的商人入河西第一站就是敦煌，他们在这里贩运大批丝绸、漆器、粮食、服饰等。因此，敦煌在当时不仅是中西交通的门户，而且是华戎在政治、商业上交流的一个大都会。

河西归属西汉版图，经多年的开发和经营，使经济得到发展，汉朝政府统治力量也不断得到加强，这样汉中央下达给河西地方政府、屯田机构、戍兵团体的诏令文书以及其他指示也就随之大量传到河西。尤其是丝绸之路开拓后，中西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汉与西域、中亚乃至欧洲一些国家也建立了友好往来的关系，因此在河西地区保留有大量的交往档案文书。然而，西汉时代我国在书写公文时尚无纸张可用，仍然沿用竹简和木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所以，在近代河西发掘的汉代文书基本上都是简牍。那么时隔二千多年，为什么在河西能够保留这么多的简牍文书呢？这与河西走廊的历史变迁、自然条件有着很大关系。

首先从历史的变迁角度看，河西地区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基本上是戎族生息的地区，中原王朝的统治势力还未伸展到这里。自汉开河西后一直到唐代，经过多年经营，河西地区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尤其是“丝绸之路”开拓后，河西地区成为丝路东段的要冲，中西之间经济、文化在这里交流频繁，这大大促进了河西地区城市繁荣、文化昌盛，使河西在全国占有的地位日益重要。正如《资治通鉴》所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阊阖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尽管这一记载泛指陇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但其中也包括河西地区。可见，当时的河西无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是相当进步的。然而，自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河西又被吐蕃、西夏等族统治，这些民族基本上以放牧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比较落后，加上战争频繁，丝路贸易中断，使河西地区的经济一度陷于衰落。至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统治者在政治、军事上推行残酷的掠夺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使河西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发生，饥荒连年，人民流离失所。到明朝初年，河西地区大片土地荒芜，水利失修，树木砍伐殆尽，沙漠面积不断扩大，生态环境

受到严重破坏。这一历史变化，使汉晋以来大量的简牍文书散失于当时的驿站、烽燧、屯田区及其他一些地区，这大概是河西保留简牍较多的原因之一。

其次从自然条件看，河西走廊的地形自东向西、由南向北倾斜，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1000 ~ 1500 米之间。这里地势坦荡，绿洲与沙漠、戈壁断续分布。因处于内陆高原，远离海洋，高山阻隔，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故成雨条件较差，降雨量较少。总的来说，河西气候干燥而复杂多变。祁连山区为高寒半干旱区，每年平均气温低于 4℃，降雨量 100 ~ 500mm。中部和东部平原以及北山山地为温带干旱区，年平均气温在 5℃ ~ 8℃，降雨量 50 ~ 200mm。走廊西部的疏勒河下游谷地，包括安西、敦煌等地，为暖温带干旱区，年平均气温 8℃ ~ 10℃，降雨量不到 50mm。整个河西走廊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其周围的县市有大片的耕作区和绿洲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和戈壁，气温变化异常，雨少干旱。这样的自然环境虽然对于发展经济，尤其是农林业经济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但对地下埋藏的古代遗物和典籍却十分有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起保护作用。近几十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掘了大量的汉唐以来的简牍、帛书，形制完好，字迹清晰，这与河西走廊日照长、干旱少雨的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二 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

甘肃历代遗存下来的文物古籍异常丰富多彩。其中简牍文书最具特色，它的内容包括大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小到下层人民的衣食住行，无所不有。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北达居延，几乎随处可见简牍的蕴藏和迹象。1906年~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古烽燧遗址发掘汉代简牍789枚，揭开了甘肃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历史序幕。1930年，他又在居延地区（古居延塞的大湾、地湾、破城子）发掘了一批简牍，计有1万多枚，称“居延汉简”。这样敦煌和居延木简、殷墟发掘的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者誉为考古学上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肩水金关等遗址发掘汉简2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新简”。同时，在敦煌马圈湾等遗址发掘汉简2.4万多枚，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汉简2万多枚。到目前为止在我省发掘的简牍数已达6.5万多枚。这些简牍质量好、字迹清晰，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从时代跨度上说，有秦、汉、晋、唐、西夏五个时代，其中以秦汉简牍最多；从内容上说，简牍记载了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俗、民族关系以及中西交通等各方面史实，为我们研究秦汉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正史之不足。当前简牍学研究已成为国际显学，而甘肃出土的简牍在这门显学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甘肃被誉为“简牍之乡”，为海内外学者所注目。甘肃的简牍用考古学方法大规模地发掘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从发掘的情况看，这6万多枚简牍来源于边塞长城城障烽燧、墓葬及洞穴。

（一）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在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发掘一墓群。其中在一号墓里出土了460枚秦代竹简，大多数保存完整、字迹清晰，因长期浸泡在墓内淤积的泥水中，竹简的质地松软而易断。简文都以古隶体书写在篾黄面，最多者每简43字，一般都在20字~40字之间。每简书写一条内容，至一章写完，如有空余，再写不同篇章，其间以圆点或竖道区分。对次序零乱的简，经过整理后，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日书》。与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简基本相同，故定名为《日书》。因其简册长短不一，某些内容稍有区别，又可分为甲、乙两种。二是纪年文书。即（今甘肃天水市）丞相御史呈奏的“谒书”。叙述一名叫丹的人的事迹。据推测，丹很可能是1号墓主，所以把这部分内容定名为《墓主记》。这部分简的内容除言天道鬼怪的迷信巫书外，更多的是涉及人事的条文，为我们了解古代人们的纪时制度、宗教信仰、政治状况以及探究民间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习俗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资料。

《日书》甲种。共73枚简。根据内容不同可分为8章，即《月建》、《建除》、《亡者》、《人月吉凶》、《男女日》、《择行日》、《生子》、《禁忌》。

《月建》共12枚简（即第1枚~12枚），主要记述了正月至十二月每月建除十二辰及与十二地支对应循环的关系。月份以正

月、二月、三月……为序，正月起，十二月止。建除十二辰以建、除、盈、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为序，起于建，止于闭。十二地支以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为序，起于寅，止于丑。如简文甲 1 载：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破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

即是说正月为建寅，以此类推止十二月为建丑。根据有关史书记载，以十二月纪年为内容者当为夏正的《月建》，说明秦统一六国前使用的是夏历，统一后虽使用颛顼历，以十月建亥为岁首，但月名并未作改变。因此《月建》仍使用夏历的建除顺序。

《建除》共 9 枚简（即第 13 枚～21 枚），是专门记述建除十二辰每一辰日的好与坏、吉与凶及对从事各项活动是否有利。如果择得良日，就会百事顺利、大吉大利，无论做官从政、祭祀祖宗、丧葬嫁娶、治病求医、畜牧农作、出门远行等等都会顺利进行，取得好的效果；反之择以坏日，则百事无成。从简文的内容看，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强烈的社会政治气味，反映出社会变革后秦的统治者既保留了奴隶制时代传统的法制观，又表现出他们不断进取的愿望。

《亡者》亦称《亡盗》，共 20 枚简（即第 22 枚～41 枚），内容主要是叙述捉拿逃亡盗贼的择日条文。每条简以天干、地支和十二生肖相配为序，记载盗者逃亡的方向、性别、长相、特征以及藏匿何处、相距路程远近、同伙人有哪些、所盗赃物是否存在、逃亡者是健在还是死亡等等。如简文载：

甲亡、盗在西方……得，男子矣（甲 22）

癸亡，其盗，女子矣，必得（甲 25）

子鼠也，以亡，盜者中人……
所入也，不得 （甲 30）

上述简文，不仅说明逃亡者趋吉避凶，而且反映出逃亡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因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以法治国，兵革不休，尤其是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经济上除了向农民征收繁重的田租、口赋、算赋以外，还无休止地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广大农民的力役负担比以往重 20 倍，出现了“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径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秦统治者为镇压人民的反抗，推行严刑苛法，人民摇手触禁，动则陷刑；一人犯法，罪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结果造成“赭衣塞道，圜圉成市”的局面。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大批农民破产流亡。秦简中记载人民脱籍逃亡，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

《人月吉凶》，共 30 枚简（即第 43 枚～72 枚）。说明了一年中的月及一月内一至三十日的吉凶。内容可分为方位和时辰。方位，是指一天中东、西、南、北四方在某时辰的吉凶。如简文载：

人月一日，旦，西吉，日中，北吉，昏，东吉，南吉
（甲 43）

时辰，是以十二地支为顺序叙述一日内某时辰的吉凶。如简文载：

人月二日，丑，旦凶，安食吉，日中凶，日失可，夕日
凶 （甲 44）

依此推至三十日。至于当时称的人月是指哪一月，简中并无记载，我们也很难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秦是以月为单位，采用十二时制的，这与有关史书记载相吻合。

《男女日》共4枚简（即第1简~4简下栏）。内容主要是按地支纪日把一月分为男人的日子和女人的日子。地支男人日是子、卯、寅、巳、酉、戌；女人日是午、未、申、丑、亥、辰。即一月中一、三、四、六、十、十一、十三、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日为男子日，共十六天；二、五、七、八、九、十二、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九日为女子日，共十四天。男女各按日行事，如有病治疗、死后埋葬等都要按各自的日子进行。简文中还特别注明男人的日子是奴隶逃亡的日子。这说明先秦时期人们择日行事、以图吉利的思想意识还相当浓厚，也反映出商周以来的占卜之术在秦也很盛行。这一习俗影响深远，至今虽无男女日之分，但择日行事仍在民间流传。

《择行日》共4枚简（即42、73、66、67简）。亦称《禹须臾行》。据有关史书记载，所谓“禹”，即禹书，“须臾”乃阴阳吉凶之法。具体地说，就是出远门者必须择日而行。根据简文42、66简记载，出远门前，先在地上画北斗，然后按禹步之法规定的程序占卜吉凶日，再择日出发。这种做法是道家“事物当行之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反映。

《生子》共3枚简（即16、17、19简）。内容是对从平旦到鸡鸣不同时辰产子是男还是女的占卜，是《日书》的重要内容。如简16载：

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西男

从简文的内容看生男或生女都有一定的时辰，这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区分性别的办法，从时辰的占有上就已贯穿着男尊女卑的成份。

《禁忌》，共 5 枚简（即 24 简下栏和 69、73 简）。主要记载禁止、忌讳之事。包括裁衣、穿衣、灭鼠、养狗、打扫畜圈、兴建土木、发兵打仗等都要注意那些禁忌之日，凡在禁日内不宜活动，不然将会不利。

上述 8 篇便是秦简甲种《日书》的全部内容，总括了与人事相关的一切活动。以月和日为主轴，细致到时辰。内容广泛而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宗教迷信等各个方面，是我们研究秦汉时期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

《日书》乙种，共 379 枚简。内容有 20 多篇，其中除《月建》、《建除》、《生子》、《人月吉凶》、《男女日》、《亡盗》、《禹须臾行》7 篇与《日书》甲种的内容完全相同外，有关《禁忌》的条目多于甲种，且有专名。如：

《门忌》，共有 30 枚简，主要记述有关门的禁忌。门有东、西、南、北、寒、仓、财门之分，故各有禁忌。如简文载：

寒门，不寒，濡泥聚，聚易所室，妻不 (乙 1)

《日忌》，共有 54 枚简，以干支记日，记述每日方位、时辰的好坏以及做事的成败。如简文载：

凡黔首行远役，毋以甲子、戊辰、丙申，不死必亡 (乙 214)

《月忌》，共有 10 枚简，主要讲述建筑宫室和房屋等的禁忌。以记官方从事的大事为主，很可能专为“官忌”所列。